建道學刊 57 (2022): 3-15

隱祕的政治與悲劇——掃羅被棄敘事的研究文獻評述

高銘謙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一　引言

撒母耳記記載了三次掃羅的被棄（撒上十三，十五，二十八章），三次都說明他被棄的原因是違背耶和華所吩咐的命令，而他的王位要交予合神心意的人——大衛來承繼（撒十三13～14，十五19、22～23，二十八16～19），這無疑是文本中世界所清楚告訴我們的神學原因。然而，學術界近年對掃羅被棄的敘事投入了不少研究，嘗試在這神學原因之外找出更多隱祕在文本背後及文本中的詮釋角度，並且使用不同的批判學與詮釋角度來分析掃羅被棄的敘事。本文嘗試就學術界對掃羅被棄敘事的詮釋進行一個比較全面的文獻評述，讓讀者明白學者看見那隱祕在文本背後及文本中的企圖與目的。

在過去的數十年，學者就掃羅被棄的敘事投放了不少研究，反映了濃厚的閱讀興趣，我們實在很難用一個簡短的文獻評述來包攬每一個研究的領域。在眾多的領域中，筆者選擇了意識形態批判（ideological criticism）

及悲劇性閱讀（tragedy framework）這兩方面。一方面是因為這兩個取向成為近期學術界的最新發展，另一方面也因為這兩個取向深深地改變了研究掃羅被棄的學術界版圖。意識形態批判期望以政治取向來詮釋掃羅被棄，認為掃羅被棄的敘事企圖正當化大衛王朝的合法地位，表面上掃羅被棄是因為違背神的命令，但背後隱祕的卻是政治性的意圖，這樣，意識形態批判屬於文本背後的閱讀，主要分析作者如何利用掃羅被棄來達到其政治目的。悲劇性閱讀視掃羅為悲劇性的代表，認為掃羅所受的刑罰與他本身所犯的錯誤不成正比，並指出掃羅的被棄是一個悲劇。這是一個文學性的閱讀，也是一個文本中的閱讀。文學批判學家嘗試在其中找到悲劇性的元素，而由於悲劇性的閱讀也同時是解經家的視野投入，所以這是一種運用悲劇性的視野進行文學批判的進路，同時帶有文本中及文本前的互動。

筆者期望在本文為讀者在這兩方面的閱讀進行文獻評述。

二　掃羅被棄作為政治宣傳工具

一直以來，不少學者視掃羅被棄的敘事作為大衛王朝的政治宣傳工具，他們通常由文本背後的傳統歷時性演變作為研究的切入點，並就不同來源與編修者的編輯取向，讀出文本背後的意識形態的寫作目的及主題。因此，這是一種來源批判與意識形態批判整合起來的研究取向。

羅斯特（Leonhard Rost）提出撒母耳記所涉及的掃羅被棄與大衛上位的敘事，來自兩個組合起來的敘事組件，分別是「繼位敘事」（Succession Narrative, SN）及「約櫃敘事」（Ark Narrative, AN），代表掃羅登基的敘事（撒上七～十五章）與大衛冒起的敘事（撒上十六章～撒下五章），可被視為兩個獨立的敘事個體，分別有其寫作的目的。[1] 大

[1] Leonhard Rost, *The Succession to the Throne of David*, trans. Michael D. Rutter and David M. Gunn (Sheffield: The Almond Press, 1982), 109-14.

衛冒起的敘事（撒上十六章～撒下五章，History of David's Rise, HDR）是由阿爾特（Albrecht Alt）所提出，[2] 他主張這段敘事的寫作目的就是說明大衛如何合理地冒起並取代掃羅，因而帶有政治正當化的寫作目的。然而，到底掃羅被棄（撒上十三～十五章）的敘事是否應該被納入在大衛冒起的敘事，卻引來學術界的爭議，亦即是說，大衛冒起的政治宣傳是否應該包括掃羅被棄的元素呢？所涉及的爭議點就是掃羅登基的敘事（撒上七～十二章）對立王的態度無所適從，有部分看似支持以色列立王（例如掃羅打敗亞捫人，以及掃羅美麗及高大的外表等），卻有部分看來是反對立王的（例如掃羅逃避不想作王，以及撒母耳臨別贈言中對以色列民要求立王的部分等）。若掃羅登基的敘事對於立王的態度不確定，又何來能被大衛冒起的敘事利用為支持大衛王朝的政治目的呢？因此，學者對於掃羅被棄敘事（撒上十三～十五章）的定位有爭議，它有可能屬於掃羅登基的敘事（撒上七～十五章），也可能屬於大衛冒起的敘事（撒上十三章～撒下五章）。

麥卡錫（Dennis J. McCarthy）提出掃羅登基的敘事（撒上八～十二章）是由三個層次的編修組合而成。第一個層次由「支持掃羅圈」（pro-Saul cycle）來形成，這個層次收集不同英雄掃羅的小故事（heroic sages）來帶出他作為拯救者的形象。第二個層次是「支持大衛圈」（pro-David cycle）的編修者，這編修者把第一層次的內容整合在大衛王朝的意識形態中，並加入了先知責備掃羅的元素來合理化大衛王朝。最後一個層次卻由另一位編修者來完成，這位編修者引入了先知（撒母耳）主導的角色，並把這角色連結到王朝興起的主題上。這樣，掃羅便被視為先知權威的合理角色，他的被棄顯示了先知的權柄。[3] 這三個層次的編修有可能反映了在先知羣體中對君王制度的理解，而這個時期相

---

[2] Albrecht Alt, *Die Staatenbildung der Israeliten in Palästina* (Leipzig: Druck von Alexander Edelmann, Universitäts Buchdrucker, 1930), 15, 36.

[3] Dennis J. McCarthy, "The Inauguration of Monarchy in Israel," *Interpretation* 27, no.4 (1973): 407-8.

信是北國被擄時（主前722年），當時南國猶大對大衛王朝的意識形態進行反思及整理，並藉着掃羅被棄的敘事來進行政治及意識形態的宣傳目的。[4] 麥卡錫的理解得到學術界的支持。

伯奇（Bruce C. Birch）視掃羅被撒母耳責備的描述（撒上十三7～15）為先知傳統後加上去的部分，其目的就是說明為何掃羅不能獲取王朝的應許，以致為大衛王朝的應許鋪路，[5] 伯奇更視掃羅攻打亞瑪力人的敘事（撒上十五章）為先知編修中後加上去的部分，[6] 反映了文本背後中北國先知羣體那種前申典編修者（pre-Deuteronomistic editor）的寫作目的，就是要描述掃羅被棄的故事來解釋為何北國的撒瑪利亞會被毀（掃羅被視為北國君王的代表），同時也反映了先知羣體場景中對於以色列王朝的負面態度。[7]

坎貝爾（Antony F. Campbell）把這種先知編修的理論推前多一步，他認為「先知記錄」（Prophetic Record, PR；撒上十一～王下十28）可被視為一個整全的古代史記，這史記由先知羣體的意識形態開始（撒上一1～十六13），去到之後關於王朝的政治目的（撒上十六14～撒下八18），這後來的大衛王朝冒起的故事把先知記錄納入在整體的敘事中，[8] 掃羅被棄的部分被視為正當化先知的權威，而這先知權威是在以色列君王制度之上，因此，這些經文都是意識形態的作品，為要服務先知的利益，[9] 這種先知的宣認甚為激進及強烈，我們甚至可以視耶戶的叛亂及

---

[4] McCarthy, "The Inauguration of Monarchy in Israel," 409-12.

[5] Bruce C. Birch, *The Rise of the Israelite Monarchy: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1 Samuel 7-15* (Missoula: Scholars Press, 1976), 85.

[6] Birch, *The Rise of the Israelite Monarchy*, 107.

[7] Birch, *The Rise of the Israelite Monarchy*, 153-54.

[8] Antony F. Campbell, *1 Samuel*, The Forms of the Old Testament Literature, vol. 7 (Grand Rapids: W. B. Eerdmans, 2003), 1-32.

[9] Campbell, *1 Samuel*, 140.

對巴力敬拜的剷除為先知政治利益的表述。[10] 這樣，掃羅被棄的敘事就被用來合理化先知羣體在以色列王國中的政治角色。

雖然麥卡錫、伯奇及坎貝爾對先知編修者所涉及的時代有不同的理解，但他們都有共識，就是這先知編修者涉及前申典編修者（pre-Deuteronomistic）的一個時期，這先知編修者把掃羅被棄的內容整合在大衛冒起的敘事中，為要合理化這個先知羣體的政治存在目的，就是要抗衡君王權力。這些學者通常以北國被毀及耶戶血洗亞哈家的背景作為文本背後的世界，掃羅被棄的敘事因而隱藏着背後先知羣體的政治目的，就是要說明先知的權力與意識形態來合理化大衛王朝的合法地位，這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在北國被毀（主前722年）之後，希西家的南國王朝成為唯一的以色列獨立國家，北國被擄的事件成為當時南國人的神學反思，為先知羣體帶來意識形態的建立，也同時合理化大衛王朝的政治意識，好使他們去支持希西家王朝。這樣，撒母耳作為掃羅被棄中先知的代表並不只是傳遞神的命令而已，而是反映了文本背後先知羣體的意識形態，這班身處在北國被毀的年代的先知羣體運用撒母耳對掃羅的責備來合理化先知對君王的抗衡，在文本中與文本背後的相互閱讀上也算是合理。

先知記錄的理論之所以重要，是為了讓學者研究HDR作為大衛政治宣傳的目的，而在其中掃羅被棄被視為合理化大衛王朝興起的重要敘事元素，有不少學者在這個HDR的層次投入了不少研究。麥卡特（P. Kyle McCarter）跟隨前申典編修者的假設（pre-Deuteronomistic editing hypothesis），認為北國先知羣體在北國亡國時南下去到南國的大衛王朝，為要去實現這班先知的理想與盼望，[11] 而掃羅被棄的敘事中（撒上十三～十五章）的撒母耳正正就是先知的形象，所以這敘事展示了

[10] Campbell, *1 Samuel*, 140.

[11] P. Kyle McCarter, *I Samuel: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Commentary*, The Anchor Bible, vol. 8 (New York: Doubleway, 1980), 18-30.

先知的權威來合理化大衛繼承王位的轉移，這正正與北國亡國與南國大衛家興起的歷史背景不謀而合。因此，掃羅被棄便是成為大衛王朝意識形態的辯護（The Apology of David）。[12]

懷特蘭姆（Keith W. Whitelam）提出「大衛的辯護」（Defense of David）的敘事名稱（撒上九章～王上二章），認為這個敘事的寫作目的就是期望得到北國支派（掃羅作代表）的支持，所以便要描繪大衛作為一個「無辜大衛」（innocent David）的形象，說明大衛在掃羅被棄的事上沒有任何參與，掃羅被棄並不是大衛所引發的政變而來，而是來自神的責罰與棄絕，以致合理化在約西亞年代的政治宣傳。[13] 桑頓（T. C. G. Thornton）卻認為「大衛的辯護」的文本背後世界應該是南北國剛剛分裂的時期，指出耶羅波安的背叛引發羅波安所涉及的大衛王朝來進行支持大衛家的政治宣傳，掃羅被棄的作用就是要合理化這種意識形態的需要。[14] 可是懷特（Marsha White）卻認為撒母耳記前面的部分（撒上一～十四章）本來是為了合理化掃羅登基而用，後來卻被支持大衛王朝的編修者引入了反對掃羅的元素，包括兩次掃羅的被棄（撒上十三、十五章）。[15] 由以上的分析可見，懷特蘭姆、桑頓及懷特都有共同的結論：掃羅被棄是合理化大衛王朝的政治宣傳工具，但他們提出了不同文本背後的寫作世界，懷特蘭姆認為編修者來自約西亞王的人，桑頓卻認為這是羅波安年代的人，麥卡特卻認為文本背後的年代是北國

---

[12] McCarter, *I Samuel*, 229-71, and P. Kyle McCarter, "The Apology of David,"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99, no.4 (1980): 489-504.

[13] Keith W. Whitelam, "The Defense of David,"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29 (1984): 68-70.

[14] T. C. G. Thornton, "Studies in Samuel: Davidic Propaganda in the Books of Samuel, " *Church Quaterly Review* 168 (1967): 413-16.

[15] Marsha White, "'The History of Saul's Rise': Saulide State Propaganda in 1 Samuel 1-14," in *"A Wise and Discerning Mind" Essays in Honor of Burke O. Long*, eds. Saul M. Olyan and Robert C. Culley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Brown Judaic Studies, 2000), 271-92.

亡國。由此可見，就算這些學者認為掃羅被棄有劃一的政治目的，但所涉及的文本背後場景卻沒有一致的共識。

這班學者所提出關於掃羅被棄的政治目的需要得到內證及外證的支持，然而學者所提供的內證與外證卻是選擇性的，例如懷特蘭姆認為撒母耳記上八至十五章的內容主要用來描述正面的掃羅形象，後來卻被支持大衛的編修者整合在整個撒母耳的敘事中，可是他卻沒有解釋為何這支持大衛的編修者沒有完全淡化掃羅正面的形象，反而卻保留掃羅一些比較正面的描述。另外，懷特蘭姆認為約西亞王的宗教改革是背後的寫作場景，可是他沒有更清楚說明當中所涉及的政治爭執如何直接地構成掃羅被棄敘事的描述，也沒有說明這敘事如何點對點地期望解決約西亞王年代的政治爭鬥。這樣，學者嘗試在內證及外證之間游走，卻不能非常肯定文本背後的世界所身處的時代。關於這方面，康崔曼（L. William Countryman）重點地說出意識形態批判的問題：

> 純粹的意識形態批判的問題，就是他們的前設實在比較多，他們傾向假設問題的答案，然後他們才問問題，然而把這些問題預設到他們所假設的答案上。[16]

在此，筆者不反對意識形態批判為我們帶來詮釋的視野，而事實上，所有經文都或多或少有其政治性的元素來正當化作者當代的企圖。然而，當意識形態批判成為唯一的解釋時，便會把多元詮釋的空間收縮，以致經文的詮釋被大大的約化，成為純粹的政治宣傳工具而沒有其他詮釋的可能。當撒母耳、掃羅及大衛被描述為純粹的政治工具時，其他豐富的神學閱讀便變得沒有可能。當經文那隱祕的政治企圖變得

[16] "The problem with more purely ideological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s that they know too much in advance. They tend to know the answers before they have asked the questions and to frame only such questions as can be answered in the predetermined way." L. William Countryman, *Interpreting the Truth: Changing the Paradigm of Biblical Studies* (Harrisburg, London, New York: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2003), 9.

不再隱祕，甚至成為唯一的詮釋角度，那麼聖經便只不過約化成為政治宣傳工具了。

三 掃羅作為悲劇的角色

當意識形態批判的學者傾向約化多元的神學詮釋時，其他解經家卻反而帶來更多激進的神學詮釋，他們採用「悲劇」的框架來理解經文，以「悲劇視野」（tragic vision）來作文學的詮釋。由於這個角度期望說明經文中關於神與人的關係性，所以也可被稱為神學詮釋的一種，然而他們卻期望揭示神黑暗或魔鬼的隱蔽一面作為他們的神學取向。[17]

耿德華（David M. Gunn）運用文學批判來檢視撒母耳的命令（撒上十7～8）以及掃羅如何在吉甲違反撒母耳的命令（撒上十三章），說明撒母耳的命令中提到要「等待」他來到的時間沒有清楚說明，[18] 由於這種「等待」時間的含糊性，所以掃羅便被無辜地陷在其中。另外，耿德華更進一步說明撒母耳記上十五章中所描述的掃羅也被指責，但他的刑罰與他所犯的罪行不相稱，帶來「罪與刑罰的不平衡」（some imbalance between the "sin" and the "punishment"），[19] 對耿德華來說，掃羅的刑罰過於他違反神命令的罪行，並直指神直接導致掃羅被棄的悲劇發生，因此，掃羅成為君王制度的犧牲品，是一個「代罪羔羊」（scapegoat）。[20] 這樣，掃羅的悲劇性被棄讓他經驗了神隱蔽黑暗的一面。[21]

---

[17] David M. Gunn, *The Fate of King Saul: An Interpretation of a Biblical Story* (Sheffield: JSOT Press, 1980), 131; J. Cheryl Exum, *Tragedy and Biblical Narrative: Arrows of the Almigh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40.

[18] Gunn, *The Fate of King Saul*, 39.

[19] Gunn, *The Fate of King Saul*, 44.

[20] Gunn, *The Fate of King Saul*, 125.

[21] Gunn, *The Fate of King Saul*, 131.

埃克斯姆（J. Cherlyn Exum）也與耿德華一樣都是對掃羅被棄的敘事進行文學批判，她期望在敘事中找出隱蔽於文本中的悲劇性元素，嘗試用「悲劇視野」（tragic vision）來找尋經文有關角色的黑暗一面。埃克斯姆指出掃羅被棄的敘事清楚地展現出悲劇的一面，她在三次掃羅被棄的經文中（撒上十三，十五，二十八章）多次發現悲劇的元素，例如撒母耳記上二十八章當中提到耶和華的沈默，正正因為這樣的沈默導致掃羅去尋找招靈的婦人而種下掃羅被殺之路。[22] 又例如撒母耳記上十三章私自獻祭並非因為違背神，而是因為他在特別的軍事處境中別無他選，便無奈地私自獻祭。[23] 再例如撒母耳記上十五章中提到掃羅沒有完全執行神的命令，但之後在他認罪時沒有得到赦免及原諒，[24] 這種種的跡象都說明掃羅是代罪羔羊，因為他代替以色列民接受神而來的刑罰，[25] 所以真正使掃羅成為悲劇的始作俑者便是神。這樣便等於反映了神魔鬼的一面。[26]

漢弗萊斯（W. L. Humphreys）與埃克斯姆及耿德華一樣都是以悲劇的角度來詮釋，但漢弗萊斯卻並非採用文學批判，反而以編修歷史的進路來找出掃羅的悲劇角色，[27] 他的分析認為掃羅作為君王制度的初哥並不能夠有效地適應，他無奈地被陷於困境中，而這個困境就是以色列民與撒母耳之間那種支持立王與反對立王的政治張力。[28] 漢弗萊斯指出這個張力早已存在於掃羅被棄的敘事中，及後卻被支持大衛的王朝利用為政治宣傳的工具，正正因為這個支持立王及反對立王的張力，掃羅便成為這個張力之下的犧牲品，活出了一個悲劇的人生。

---

[22] Exum, *Tragedy and Biblical Narrative*, 23-25.

[23] Exum, *Tragedy and Biblical Narrative*, 25-27.

[24] Exum, *Tragedy and Biblical Narrative*, 28-29.

[25] Exum, *Tragedy and Biblical Narrative*, 38-40.

[26] Exum, *Tragedy and Biblical Narrative*, 40.

[27] W. L. Humphreys, "The Rise and Fall of King Saul: A Study of an Ancient Narrative Stratum in 1 Samuel,"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18 (1980): 75-78.

[28] Humphreys, "The Rise and Fall of King Saul," 79.

耿德華、埃克斯姆及漢弗萊斯都主張悲劇性的詮釋，但他們卻帶有不同的詮釋角度。耿德華認為掃羅的悲劇來自神那種含糊性的吩咐以及罪行與刑罰的不對等，他把掃羅的宿命與他個人的錯誤放在一起，但他卻認為宿命先於錯誤，甚至認為掃羅的宿命導致他的錯誤，以致被棄，是一種悲劇。筆者認為耿德華的解釋讓宿命吞噬了錯誤，掃羅被棄是因為神迫使他有這宿命，導致他的錯誤，所以掃羅是無辜的。埃克斯姆認為掃羅的宿命來自他在吉甲時沒有自由作出抉擇，以及神在他犯錯時沒有賜下赦免，埃克斯姆視掃羅被棄包含了宿命與錯誤，但宿命卻比他的錯誤更壓倒性，掃羅的認罪理應得到神的赦免，但神卻不赦免，所以最終要負責的是神。漢弗萊斯認為掃羅是完完全全的無辜及受害者，因為他多次都被陷在困境中，而他也沒有甚麼可選擇自救的空間。由此可見，三位學者都認為掃羅是悲劇性的角色，對神抱有負面的觀感，掃羅成為代罪羔羊與受害者。由這三位學者詮釋的異同可見，就算不同學者同樣都使用文學批判，都會帶出不一樣的結果，說明文學批判本身並不是一種閱讀的方程式，彷彿能帶領讀者去到同一個詮釋結論一樣，反而，學者帶着自身不同的前設去運用文學批判，這些閱讀的前設才是詮釋結果的關鍵。

把掃羅視為悲劇的詮釋假設他在關鍵的時刻沒有任何更好的選擇，神把他迫到牆角，以致他只能在這宿命中成為受害者與代罪羔羊。由於掃羅被視為受害者，所以他並不需要為他所犯的錯承擔後果。反而真正犯錯的是耶和華，神擁有祂的黑暗面甚至魔鬼的一面。然而，這種悲劇性的閱讀並非沒有它的缺點。首先，經文指出神期望掃羅的王國要存到永遠：**若遵守，耶和華必在以色列中堅立你的王位，直到永遠。**（撒上十三13）神打從起初便期望掃羅的王國存到永遠，這是神本身的心意，若掃羅願意遵守神的吩咐，神便不會棄絕他。第二，約拿單成為掃羅的反面例子，說明掃羅在關鍵的時刻並非沒有選擇的空間，約拿單在攻打非利士人時曾說：**因為耶和華使人得勝，不在乎人多人少。**（撒上十四6）約拿單宣認耶和華使人得勝並不取決於軍隊人數的多少，

而是取決於神本身，這反照出掃羅本身對百姓離開他而散的事之着緊（撒上十三11），若掃羅能活出約拿單的信心，遵守神的吩咐而不私自獻祭，他一樣可以經歷約拿單的得勝。由此可見，掃羅並非沒有更好的選擇，經文多處說明倚靠神及全然遵守神的吩咐是更應該要做的事，並非如學者所想像的無辜與悲劇。

弗雷瑟（Terence E. Fretheim）這樣說：

> 可是，我們可以質疑這〔悲劇性閱讀〕是否真的是經文所呈現的神，又或只是學者們自身有個人對神如何藉經文所說的東西有疑慮而已，這裏似乎對故事中悲劇的元素帶有濃厚的興趣，把掃羅提升為無辜的受害者，指出掃羅在他的處境中沒有任何選擇……這對我來說，似乎經文沒有這樣說。[29]

弗雷瑟認為歷史的未來是開放性而不是一個宿命，神隨時都願意嘗試新的解決方式並重視每個人的處境，神之所以要棄絕掃羅，並非因為這是他的宿命，而是因為事情已去到無法挽回的地步。[30] 弗雷瑟說明悲劇性閱讀的學者把自身的神學困難帶進經文當中，但這種投射並沒有經文實在的支持，也沒有細心地了解經文一些重要的神學主題，經文沒有描述神有任何黑暗或魔鬼的一面，也沒有說明掃羅悲劇的元素，經文卻帶領讀者去到人生處境的矛盾性，在複雜的場景中所尋求的並不是片面的簡單答案，而是邀請讀者去提出問題並期待神有血有肉來回應。若我們簡單地把神視為魔鬼，把掃羅視為受害者，我們便不能夠看見經文

---

[29] "One is given to wonder, however, whether that is actually an aspect of the God revealed in the text, or whether scholars have more personal theological problems with the way in which the God of the text speaks and acts. There seems to be an inordinate amount of interest in these studies in portraying the 'tragic' character of the story, in lifting up Saul as an unwitting victim of circumstances beyond his control. ....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story is here being pushed into a literary mold that simply is not there." Terence E. Fretheim, "Divine Foreknowledge, Divine Constancy, and the Rejection of Saul's Kingship,"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47 (1985): 599 n. 20.

[30] Fretheim, "Divine Foreknowledge, Divine Constancy, and the Rejection of Saul's Kingship," 600-601.

所呈現的複雜性。聖經敘事所展示的生命並不是非黑即白，任何閱讀掃羅被棄的人需要以真實的生活場景與信仰實踐來閱讀。

四　總結

總結來說，意識形態批判傾向「大衛的辯護」，把掃羅被棄的敘事視為大衛王朝的政治宣傳工具，若我們把這種隱藏在文本背後的意識形態推到極至，視之為唯一的寫作動機時，那麼便容易帶來約化的危險，扼殺了多元閱讀的可能。悲劇性閱讀傾向對掃羅及耶和華帶來片面及單一的閱讀，支持這種閱讀的學者嘗試以文學批判或來源批判來帶出經文中悲劇及受害者的角色，以宿命或代罪羔羊的詮釋角度來看經文，自然會帶出所謂隱藏在其中的悲劇元素。然而，這種「悲劇視野」（tragic vision）主導了文學批判的選取，把經文中與這視野吻合的元素取出來，卻忽略了經文明顯地提到關於神或掃羅被棄的神學理由，似乎未能反映出經文完整的意思。

掃羅被棄敘事中隱蔽的政治與悲劇，的確需要有政治的眼界與悲劇的視野才能看出來，但最終都要通過申典作者（Deuteronomist）的傳遞與編修，才把掃羅被棄的經文帶到我們手上，我們又是否真的如此有信心拿開申典作者的神學編修，在前申典作者的編修中找到政治的理由？我們是否真的把人性的複雜與神人之間的有血有肉互動約化，單單以悲劇的元素來為掃羅或耶和華立下標籤？

撮　要

掃羅被棄敘事的研究主要所涉及的領域包括意識形態批判及悲劇性閱讀。意識形態批判期望以政治取向來詮釋掃羅被棄，認為掃羅被棄的敘事企圖正當化大衛王朝的合法地位，表面上掃羅被棄是因為違背神的命令，但背後隱祕的卻是政治性的意圖。悲劇性閱讀視掃羅為悲劇性的代表，以悲劇性的視野嘗試說明神那種黑暗及魔鬼的一面。本文為這兩個進路進行文獻評述，說明其利與弊。

ABSTRACT

Researches into the narrative of the rejection of King Saul involve ideological criticism and tragedy framework. Ideological criticism aims to interpret the rejection of Saul as a political propaganda for legitimizing the Davidic kingdom. Scholars have tended to uncover the political motive behind the narrative. The tragedy paradigm represents a cluster of scholars who categorize the figure of Saul as tragedy. They approach the narrative with a "tragic vision" to uncover the "dark side" or "the demonic side of God" in the framework of tragic fate. This paper aims to survey these two approaches and attempts to illustrate their merits and drawbacks.